



一九七八年，廖容标在上海。



上：黑铁山外景

下：一九四〇年七月，李济标在山东莱阳县后城子村，随三八路平山游击队第四支队司令员。



## 特殊的使命

“游击战，敌后方，……钢刀插在敌胸膛。”八路军军歌里的这句歌词，使我联想起抗日战争初期那段比较紧张、艰险的斗争经历，它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如此之深，虽然几十年过去了，却好象是不久前刚发生的一样。现在，我把它回忆、记录下来。

我要叙述的这段经历，大都发生在山东省淄(川)博(山)地区和小清河一带；但是，故事的开头还得从陕北延安谈起。

就在芦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，我党中央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，要求我们立刻给进攻的日寇以坚决的抵抗，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。这时我正在延安的抗大学习。

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红军大学，它刚从保安迁来延安。我所在的军事一队，多数是从红军各个部队里抽调来的师、团级军事干部。大家都很年轻，都很好学，都很珍惜这样一次学习、提高的机会。但从日寇大举进犯的消息传来，大家就再也坐不住了，要求提前结业、返回战斗部队的

报告，象雪片似的飞到队部。不久，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，并立即东渡黄河，开赴华北抗日最前线。我们抗大的学员也一批又一批地提前结业，奔向抗日战场。

军事一队结业时，绝大多数同学都分配回部队去了，就剩下我和洪涛等几十个同学留了下来，这可把我们急坏了。入学前，我在直属总部的红五团担任团长，得知抗大要提前结业，战友们不断来信问我何时回部队去，还说要派人来接我哩！洪涛同志，来校前也是团长，听说他以前所在的部队已经东渡黄河了，所以，盼望回去的心更为迫切了。我们俩一天几次地到队部、到校部去探听消息，后来，才知是总政治部决定把我们留下，由他们统一调配。洪涛同志悄悄对我说：“难道要我们改行做政治工作？”我只简单地回说：“摸不准。”其实，我对另行分配，心里可高兴哩！如果确定我回原部队，总部的直属团队至少暂时要留守后方，而我衷心希望的是立即上前线。

背起背包，离开抗大，我和洪涛同志怀着各种猜测和争取早上前线的心愿，跟着另外几十位同学一起，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驻地。

负责接待我们的，是总政组织部的干部，是一位既和蔼又热情的同志。他先是招呼我们坐下喝水，接着又一个一个地问长问短，最后，又把我们引到一间已经铺好了铺草的大屋子里，要我们住下休息，就是不提分配工作的事。

当天晚上，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亲自到我们屋子里来，他看到我们的背包都没有解开，风趣地说道：“今晚就

想上前线去？好得很，好得很啊！”

我们的思路，被任主任一语道破，大家都乐呵呵地笑了。任主任坐下来，象唠家常似地说着：“你们说说，‘前线’两个字，怎么个解释？”我们一时没听懂任主任问这问题的用意，都愣住了。任主任笑笑，自己回答说：“依我看，哪里有敌人，哪里就是前线！”

任弼时同志接着讲起“实行全民抗战”的必要性。他用一些生动的例子，解释什么叫“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”；讲述怎样在敌人后方展开群众工作，组织抗日武装，建立我们的根据地；……总之，所有的话题，都围绕着“敌后”两个字，把我们急于上前线找鬼子狠狠干几仗的思想，慢慢地引到去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，开辟敌后战场，建立抗日根据地这一伟大战略任务上来了。

任主任和我们一直谈到深夜，最后，他又望望我们的背包，说道：“你们赶路一定累了，先好好睡上一觉。把背包解开吧，在敌后的斗争上，你们的经验还很少，必须好好学习。”

就这样，我们在总政主办的“白区干部短训班”里，学习了党中央、毛主席提出的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”；温习和讨论了游击战的战术原则；同时，也学习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。在这半个月中，党中央和总政首长曾多次来给我们作形势和政策报告，给我们认识上、思想上解决了不少问题。通过学习，总的去向明确了，任务也明确了，方针、政策也初步明确了；但是，具体地说，将去哪里，那是一个怎样

的敌后环境，那里的群众条件怎样，我们又将怎样去把那些普通老百姓武装起来，去和那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正规军作战，直到最后胜利，这在我们心中仍然是无数的。

临结业时，任弼时主任又谆谆嘱咐我们：要有白手起家的精神，勇于克服一切困难，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。最后，还鼓励大家：目前革命正处在高潮形势下，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，我们只要紧紧依靠各地党的组织，依靠群众，正确贯彻党的政策，就一定能在敌后生根发芽，创造出新的成绩来。

九月下旬，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，全歼日寇一个精锐旅团，捷报飞传，震惊中外。就在这一伟大胜利中，我们这一批学员，带着党中央赋予的特殊使命，兴奋而又依恋地告别我们的第二故乡——延安，奔向八路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——太原市，然后再转道去敌后。

太原是山西省的省会，军阀阎锡山的老窝。在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下，阎锡山同意八路军在太原设立一个驻晋办事处和前线指挥部。

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，很快就接见了我们。他说：你们当中的一些人，将要去前线部队和新军<sup>①</sup>工作，大部分要到敌后去，还有少数人，暂时留在办事处协助招收学兵的工作……。彭雪枫同志是

---

① 新军，指在我党抗日统一战线影响下，阎锡山依靠共产党员的帮助，建立起来的一支抗日部队。

我比较熟识的一位老首长，不过，他的年纪也不大，四年前，他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的政委，才只二十六岁。但是，他已是全军闻名的文武双全的优秀青年将领。由这位熟悉的领导同志来分配工作，使我心里很快生出一丝希望——他了解我，可能满足我的要求，让我到前线战斗部队去。但结果，我仍被划入暂留办事处的几个同志的名单之中。

一天、两天……七八天过去了。前线消息不断传来，敌人正在疯狂进攻，人民遭受深重灾难，我们却坐在这里“待分配”，怎不叫人着急！想找这位老上级提个意见吧，看到他是那样忙，往往白天不避空袭，夜里工作到天明，怎能再去打扰他呢？就在我们急得坐立不安的时候，彭雪枫同志找我去谈话。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，一开口就笑嘻嘻地问道：“等急了吧！”我嗯了一声。他接着说：“好，现在党决定派你到山东敌后去！你有什么意见吗？”我脑子里又闪现起再争取一下的念头，但是，想到任弼时主任讲过的话，想到组织上正需要更多的同志去敌后工作，我就克制了个人的愿望，只简单地说了一句：“服从组织分配。”

彭主任高兴地地点头，显然对我的表态感到满意，他亲切地把我看了好一阵，问道：“你在红四师十团当过连长？”“你的手指和下巴是广昌战斗中被手榴弹炸伤的是吗？”我激动地一一作了回答。这位工作相当繁忙的首长，对自己部属的一切，是了解得那么清楚，记得那么准确，使我内心对他更加敬佩。

“很好，我们老友重逢。”接着，他又对我说，“按规定，到

敌后去的同志，把党证和文件、军用物品都交给组织保存，等胜利归来时，再还给你。”

尽管我早已懂得这些普通的常识，可是，当我伸手从贴胸的衣袋里摸出党证，眼前出现那画有镰刀和铁锤的封面时，脑子里竟会嗡嗡地响了起来，手指也僵硬得不听使唤了。这个印得并不十分精致的党证，上面刻着自己决心以生命去实践的入党誓词。自一九三一年我从共青团员转为正式党员以来，它在我的贴胸衣袋里整整放了六年零七个月了。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啊！它伴着我转战闽赣苏区，捍卫红色政权；又伴着我爬雪山，过草地，长征两万五千里……如今，却不得不暂时分手了。我轻轻地翻开它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把那久已背得烂熟的入党誓词，又默读了一遍。彭主任注视着我，大概很理解我这种心情，始终平静地耐心地等待着。直到我双手合上了党证之后，他才轻言慢语地劝慰道：“这是党的需要啊！你是老同志，为啥这样做，你是理解的……”我点了点头，双手把党证捧着递了过去。

接着，彭雪枫主任详细地向我交代了工作任务，亲手交给我一封用药水密写的介绍信。另外给我一个北平流亡学生的身份证件，上面的名字已改为“廖之秀”。于是，我便脱下那套洗得发白的军装，换上一件当时大学生爱穿的阴丹士林布长衫，戴上一顶灰色呢子礼帽，胸前别上一枚校徽。从这时起，我想：我已经是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了，一切言行必须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特有的规定和纪律。

从彭雪枫主任那里回到住所，看到洪涛同志也已换上

了便衣。我俩从上到下地相互打量着，挑剔着对方一切可能发现的漏洞，又互相演练了脱帽戴帽，以及怎样用拇指、食指、中指捏住礼帽的动作和姿态。真是一切都得从头学起，就连说话、吃饭、走路，都要改变军人的习惯。

我和洪涛同志都是江西人，长征走的一条路，抗大编在一个班，下太原又是一道来。论年岁，他二十五，我二十六；论军龄，他二八年入伍，比我早一年。我俩都担任过团一级的军事指挥员，有着许多共同的语言和习惯。从一九三七年四月进入红军大学以来，我俩朝夕相处，情谊很深，眼看就要各奔西东，心里有很多话想说，可是又不知从哪里说起。在抗大宣布结业时，我们曾相互在对方的小笔记本上留下了各自的部队番号、家乡详细住址。现在，这些小本子都要上交了。我默默地翻到记着洪涛通讯处的一页，反复默记着：“洪涛（洪遇良），江西横峰……。”他也把记着“赣县韩坊水口区水口村”的那一页翻给我看看，笑着跟我说：“我到过你们赣州，你还没到过横峰吧，等革命胜利了，如果互相失去联系，可以先写信到横峰去查问……”这天晚上，我们谈了很久。因为他有肺病，不宜过度疲劳，在我的一再催促下，才收住了话头。

和我们一道分配到山东的，还有韩明柱、赵杰、程绪润等抗大同学，因为组织上采取个别交待，分头行动的方式，当时谁也不知道别人的去向。

在出发前的一次庆祝胜利的电影晚会上，来太原视察、指导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，接见了我们这些去敌

后的干部，并给我们讲了话。他说，到前线去领兵打仗，要机智、勇敢，讲究战略战术；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，更要有敢于斗争，敢于胜利的信念；要善于运用党的政策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这一切又要以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、武装群众为基础。

周恩来同志在结束讲话时，号召我们：党把你们当作种子撒向敌后，希望你们很快地在敌后生根发芽；希望你们很快地带起几十万革命的抗日部队，在敌后闯出一个新局面来。党和全国人民，期待着你们的捷报！

## 去敌后的路上

黄土高原的十月，已是秋风萧瑟，寒意逼人了。

目前还算是“国军”后方的太原市，被前线溃散下来的国民党部队搞得乌烟瘴气，一片混乱。这些官兵，根本就没见到日本鬼子的面，就如惊弓之鸟，纷纷溃退。他们经过城镇和乡村，故意夸大宣传鬼子凶暴的气焰和精锐的武器，宣传鬼子杀人、放火、奸淫、掳掠的恐怖景象，用来恫吓群众，搞得人心惶惶，为他们这些全身武装的“英雄好汉”所以不战而退、闻风溃逃自找理由。同时，他们又依靠手里的武器，一路打家劫舍，抢夺难民们随身携带的一点财物。当他们到达太原时，不仅大小包袱累累，而且，个个箱笼满载了。

天刚一亮，街头巷尾，就可以看到这批穿着军装的“小贩”，满地摊开着各式各样的货物在叫卖，为太原的早市创造了异乎寻常的繁荣。一些没有抢到什么值钱东西的，或是虽然抢到却在赌博场上输光的“败兵”，也真亏他们想出了另一种生财之道：拄着一根拐杖，冒充伤兵。他们到处横

行无忌，招摇撞骗，一不称心，就举起拐杖追打老百姓。他们行动敏捷，威风十足，连伤兵的“招牌”也不顾了。

只有在傍晚，太原街头才出现另一番动人的景象：那是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宣传队上街了。他们扛着大旗，一面散发传单，一面敲锣打鼓，唱歌演剧。激昂慷慨的抗日歌声，振奋着人心。宣传队被人们紧紧地围住，男女老幼都有，自觉地为宣传队拉开场子。精采的演出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。年轻人热泪盈眶，激动地跟着宣传队一齐高唱救亡歌曲。也只有在这时，才能看到群众中长期被压抑着的要求民族自救、同仇敌忾的悲愤气概。自然，这种生气勃勃的场景，对国民党反动派来说，是十分头痛和恼火的。他们深恐群众发动起来，就会动摇他们的统治，所以，对人民群众的抗日行动，总是百般阻挠和破坏。

离开太原的那天，办事处的同志领我们去乘火车。那时，阎锡山政府表示要对我们优待和照顾，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中，拨出一节作为八路军的专用车厢。因为白天经常有敌机来轰炸，太原附近的火车都是在夜间开。我们那节专用车厢，就挂在列车的最末尾。为了防空，车站上和车厢里都没有点灯。我们摸黑上车，也看不清车厢的外表和设备，但单凭迎面扑来一阵阵又酸又臭并带点霉烂的恶腥味，就可想见这种“优待、照顾”的真正含义了。我们去敌后心切，对这些都不计较，每人摸进去找到一个容膝之地，就相互偎依着打起瞌睡来了。迷迷糊糊地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天色亮了。睁眼一看，可真把人的肚子气炸了！原来，车站上，孤

零零地只剩下我们这一节“八路军专用车厢”，整个列车，昨夜已偷偷地把我们甩下，摸黑开走了。

生气也没有用，只好再去交涉。费尽口舌，最后还是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派汽车把我们赶到前面的一个小站，去搭上了另一列火车，总算离开了太原。

火车驶过几个小站，来到一个较大的车站。车还没停稳，等在车站上的一批国民党散兵，早已扒住车门上的把手，争先恐后地拥进各节车厢里来。

车厢里，原已塞得满满的，被他们一冲，秩序就更乱了。趁着紊乱，他们一面对着身边的乘客开口就骂，举手就打，一面又顺手牵羊地偷走老百姓的东西。如被失主发现或是当场抓住，他们就干脆明目张胆地抢了。辱骂声、吆喝声、呼救声、号哭声……此起彼伏，不绝于途。

我们这节虽名叫“八路军专用车厢”，也无法避免这种“冲击”。我是学生打扮，坐在两旁的同志，有的穿西装，也有的穿长袍，打扮得象教师、商人似的。粗看一眼，还真会把我们当作是斯斯文文的一群。有几个国民党士兵，就凭他们手里有枪，身上有力，毫不客气地挤进我们的座位里，硬要把我们挤出去。我忍无可忍，就对他们说：“这里实在挤不下了，你们到别的地方再找找座位吧！”这一说，可把他们得罪了。其中一个又矮又瘦的老兵油子，怒目圆睁，脖子上的青筋也突起来了。他一口四川话，冲着我的脸，唾沫飞溅地骂道：“捶子！你这个亡国奴坐得，老子坐不得？滚！”口到拳到，一拳飞过来。我也眼快，一抬手，就把他那只羊腿

似的手臂，在半空里抓住了。这家伙是个熊包，一点劲也没有。他的手臂被我抓紧了，浑身都动弹不得。依我性子，真想给他一顿狠揍，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但，考虑到自己有任务，还得忍住一些。这时，坐在我们邻座的一位穿军装的同志，站起来指着我对他们说：“他不是向后方逃的亡国奴，他是我们八路军的一位干部。他是到前线去打鬼子的！”

那些正要拥上来帮四川兵打架的士兵，一时愣住了，他们懂得，我们所说的“干部”，在“国军”里就是官爷们，小兵竟敢跟当官的胡闹，这不是自己寻死吗？四川兵慌忙陪笑说：“误会了，误会了，对不起！”然后，便一溜烟地拥到另一个车厢去了。

我们终于到达同蒲路的终点站风陵渡。我们必须在这里横渡黄河，再乘陇海铁路上的火车，继续向东去。这天是阴天，空中乌云疾驰，狂风怒啸，黄河犹如一群烈马，咆哮着掀起滚滚怒涛。我们乘坐的那只方头渡船，就在这瞬息万变的洪峰浪谷间挣扎着前进。船身被浪涛冲击得失去平衡，随时都好像有沉没的危险。

过了黄河，就是潼关。按照组织上事先指定的地点，我找到了秘密交通员。他已买好了同往济南的车票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就上了火车。

列车东去，离前线越来越近，因此车厢里就空荡荡的。而迎面开来的车厢，正好相反，和同蒲路南下的列车一样拥挤。

列车在一个小站上停下来。月台上有个小贩在叫喊：

“又酥又香的烧鸡，两毛一只！”我被他喊得肚子咕咕叫，就伸出头去招呼：“来，我买两只鸡婆。”卖烧鸡的人，走过来朝我呆望着，看来没有听懂我的江西土话。幸好交通员走过来，才帮我把烧鸡买妥。

我咬了一口，觉得这烧鸡味道不错，赞了一句：“这鸡婆，满好食！”交通员朝我笑笑说：“你的土话太重，今后……”他大概想说，今后在敌后工作不方便，但没有说出口，就马上改变了口气告诉我说：“这一带，鸡婆叫做母鸡；满好食，应该说：很好吃。”

接着，他就放低嗓门，教我说一些常用普通话。乍学倒蛮感兴趣：学多了，记不住，反而使我不敢张口说话了。

夜已深，大家都在漆黑的车厢里睡着了。我的心里，却一直不能平静下来。时而想起过去的战斗生活，时而想着即将面临的斗争。列车一震动，手指也会碰巧触着那封缝在衣襟里的秘密介绍信，我不禁想到刚才的普通话教学，又联想到任弼时主任的教导……是啊，一切都需要从头学起，而且，必须很快地学好，因为，历史压在我们肩上的使命，是多么重大！

## 意外的决定

火车到济南，是在夜间。本想一下车就赶往彭雪枫同志交代的联络点——齐鲁大学去。出站一看，岗哨林立，气氛紧张，戒严了。交通员同志扯扯我的衣襟，悄声说：“住店”。说着，就把我带进了车站旁边的一家旅馆。这时，从附近马路上不断传来“站住，不许通行”的吆喝声。这真叫人奇怪：日本鬼子还没过黄河，济南为什么搞得如此紧张啊！后来，听旅店工友同住店的客商在一旁议论，才知这是专门用来对付不久前从北平南下的一批流亡学生的。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这个大军阀，对待宣传抗日的流亡学生，也真是煞费苦心：爱国学生白天出来宣传抗日，当局说是违背防空禁令，派军警立即驱散；晚上上街演出，他们就实行宵禁，一律不准出门。

第二天早饭后，交通员同志雇来两辆黄包车。这使我感到为难。自己年轻力壮，长着两条会走路的腿，却让一个衣衫褴褛的车夫拉着走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但为了少讲话，减少问路的麻烦，也只得坐着车子去。

车子拉进了齐鲁大学校园。当时地下的山东省委的对  
外联络员、大学教授张友渔同志，把我们带到他的房间里。  
我把那封用药水写的介绍信交给了他。张友渔同志十分热  
情地向我交代了与省委领导同志会面的时间、地点和联络  
暗语，并让我马上搬到专门接待平津流亡学生的第一师范  
学校去住。

按照约定的时间，我手捧一本精装书，在第一师范第三  
教室的门前，边走边看。迎面来了一位身穿大褂、头戴礼  
帽，围着一条黑色长围巾的中年人。他若无其事地从我面  
前走了过去，又转身用眼梢打量了我。等周围只剩下我们  
两人时，他才挨近我轻声问道：

“贵姓？”

“廖之秀。少请教？”

“敝姓黎，黎明的黎。”

暗语对上了，他就引我到学校后面的树丛中，开始了正  
式谈话。

这位同志就是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。

黎玉同志首先向我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“每  
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，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”的号召，  
接着，又给我介绍了当前山东的情况，省委关于开展游击战  
争的准备，和现在各地都来请求省委派遣军事干部等。并  
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。我说：“只要求早点分配工作。”

他笑笑说：“在军队里工作惯了的同志，就是急性子。你  
的工作嘛，等省委研究后，马上通知你。”